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理解与接受中意义的构建

申迎丽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I046/18

2008

译学新论丛

长柏然 许 钧

理解与接受中意义的构建

—— 文学翻译中“误读”现象研究

申迎丽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解与接受中意义的构建:文学翻译中“误读”现象
研究/申迎丽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1

(译学新论丛书)

ISBN 978-7-5327-4408-4

I. 理… II. 申… III. 文学-翻译-研究 IV.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6817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理解与接受中意义的构建

——文学翻译中“误读”现象研究

申迎丽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61,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250 册

ISBN 978-7-5327-4408-4/H·807

定价:2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401196

总 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

化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 50 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

总序
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1989年与1993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20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20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3位之外,其余17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2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6大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5个流派都是近50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20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2007年8月18日于南京大学

总
序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内容	/3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	/7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1
第一章 “误读”的现象与分类	/13
第一节 无所不在的误读:典型误读案例举隅	/15
第二节 误读的研究:误读与文学、哲学、翻译	/24
第三节 “误读”的多重分类	/54
第二章 “误读”原因探索	/75
第一节 误读原因内部研究	/77
第二节 误读原因外部研究	/166
第三章 “误读”的效果、影响与意义	/179
第一节 误读的负面效果与消极影响:对译者素质的要求	/182
第二节 误读的戏剧化影响与效果	/200
第三节 创造性误读的正面积极意义:原作意义的实现 与丰富、译者与读者主体价值的体现与制约	/206
第四节 误读所带来的学术“本土化”的意义	/221

目录

Contents

第四章	研究“误读”的启示	/ 247
第一节	尝试突破一种思维框架	/ 249
第二节	寻求“间性”	/ 252
第三节	在翻译现实中不断调适的对话与交流的理想	/ 256
第四节	对翻译本质的思考:驯服	/ 266
第五节	译者角色定位:从“镜”到“灯”	/ 285
第六节	翻译的地位	/ 289
结论:	翻译中原作与自我意义的双重构建	/ 291
	参考文献	/ 299
	后记	/ 329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内容

“正读”是一种尽量接近文学作品客观内容与创作意图的传统的阅读方式。“正读”相信“正确阅读”的可能性,相信文学作品作为有意识的审美创造活动的产品具有相对稳定与确定的意义,阅读便是识别和解释或者说复原这些意义内容。^①

从字源上来看,“误读”作为“正读”的对立面,“误”表示对“正”的“偏离”(swerve, deviation and sometimes being totally wrong),如果读是一种行为,显然“正/误”并非对读之行为做出价值判断,而是对读之结果,即对与读的对象相遇后读的主体所获得的理解和解释做出或“正”或“误”的二元判断。判断就涉及到标准。我们知道所有读的行为背后都隐藏着对意义的探询之原初动力,也就是说我们肯定与我们相遇的事物一定含有某种意义,我们才会展开读的行为。而判断对错标准的存在说明我们不怀疑读的对象有一个终极的、确定的、可以通过反复地读的行为而挖掘出来的相对准确的原初意义,即本义。关于意义是什么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但对于意义的界定从来就没有一个定论。如果判断“误读”与否的

^① 关于“正读”的论述参考汪正龙,《文学意义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8—139页。

标准或者说前提本身就并非十分稳固,那么“误读”这个概念就需要得到重新考察。

“正读”之“读”看似关注读者的阅读行为,其实质考察中心是作者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正读”相信文学作品具有相对稳定的意义内容,此时意义主要来源于通过文字对作者本义的推断。但由于原创作时的主观条件、历史条件等等往往不可考察或者与读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间与空间距离,在挖掘本义的过程中对作者本义的复原往往变成了通过文字进行的推测或者有时为臆断。因此,“正读”往往是局部的、不完全的,也可以说是对文学阅读的一个理想悬设,一种正确阅读的可能性。

绪
论

“误读”与“正读”相对,“正读”要求解读文本以复原再现原本文本为目标,而“误读”从字源上来解释,指对原文的解读偏离了原本文本,这种偏离可以是增加原文所没有的意义内容(诠释过度),也可以是没有充分挖掘与展示原文全部的意义(诠释不足),或者有时出于某种目的对原本文本进行歪曲。

随着 20 世纪相对主义思潮的兴起和解构主义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质疑,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和作者意图论遭到了质疑,“正读”的可能性遭到怀疑,源于文本的阅读、理解与阐释活动的“误读”成为了意义解读的流行方式。布鲁姆说:“在尼采和弗洛伊德之后,要完全回到寻求复原本文意义的解释方式是不可能了。”^①在布鲁姆那里,一切阅读均是误读,只是强弱不同而已。误读已经成为一种强调创造性的文学阅读方式。

可以看出,“误读”与“正读”表面上处于一个范畴,是二元对立关系的两极,以原文作者、原本文本为关注焦点;但随着“误读”已经发展为一种关注读者角色,强调读者创造性阐释的文学阅读方式,发展为一套阅读阐释

^① 布鲁姆著,朱立元、陈克明译,《误读图示》,台湾:骆驼出版社,1992 年,第 84 页。

释理论,“误读”与“正读”两个概念的关系已经复杂化:就“误读”这个概念的使用来看,时而作为“正读”的对立面表明对原文本义的错误理解,时而脱离“正读”的樊篱,表明读者对原文的某种创造性合理解读。当“误读”作为“正读”的传统对立面时,侧重于文本还原;当“误读”脱离正读束缚作为独立概念时,侧重于读者对原文的接受、修正、突破与创造。

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误读”背后“正读”概念始终如影随形。就文学作品而言,读者的释义活动固然是文学作品意义构成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但作者赋意、文本传意是意义构成另外两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必须承认,文本始终是意义阐释活动的基础与制约,文字的客观性赋予了文学作品意义以一定程度不可辩驳的客观性,只是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意义的非精确性与读者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解读活动使得意义同时具有了某种被给予性。

对意义的探究贯彻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中,翻译的起点与终点同样是意义。对翻译来说,翻译过程也是一个对原文意义理解和再现或者说解释和重构的过程。我们可以将翻译过程简单划分为“生产”和“流通”两个环节,前者的主角是译者,后者的主角是译作读者。译者首先作为读者要对原文进行以尽可能把握原文意义为目的的解读,然后在文字转换的表达阶段将个人理解的意义传达出来。译文读者通过对他们所熟悉的译作文字的解读,以期得到对译作意义(或者对很多人来说译作就是他们的原作)的理解与把握。翻译的“生产”与“流通”两个基本环节有一致之处,即都涉及到文本的阅读、接受、理解与阐释;不同之处在于译者还肩负着通过文字转换进行意义表达的任务,也正是这一点将翻译实践与阅读理解活动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开来。

无论正确阅读是否可能,无论是“正读”作为阅读追求的主流还是“误读”成为新的流行,阅读和翻译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翻译以语言或符

号的转换为具体形式,但翻译的根本目的是“意义”的再生成,翻译是文化交流过程中发生的一种意义理解、阐释、再生和传播现象。阅读、意义、理解等词汇始终是翻译的核心概念,只是这些概念内涵的变化影响着翻译的理论发展。

索尔(L. Söll)指出:“一部翻译理论史实际上相当于对‘翻译’这个词的多意性的一场漫长的论战。”^①“翻译是什么”,即翻译的本质问题是翻译理论研究的第一要务。对翻译的不同定义或概括体现着理论研究者对翻译本质的不断探索,而鲜活的、不断变化的翻译实践与复杂的翻译现象又对翻译的理论提出了挑战。理论的有效性依赖于解释的有效性。意义“既是翻译的出发点,也是翻译的归宿”^②,通常被理解为通过语言间转换实现意义再现的翻译定义,在翻译活动中层出不穷的语文与非语文因素引起的“误读”现象面前遇到了挑战。

挑战一:似乎不言自明的“意义”变得难以把握,对翻译研究者来说,什么是意义永远是个说不尽但又无可逃避的课题。

挑战二:当意义的构成变得复杂,再现或者丝毫不差地传递意义成为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那么就“意义”而言,翻译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实现了怎样的目的。

挑战三:当翻译中无处不在的“误读”已经不能再简单地归结为“误译”,当或强或弱的“误读”产生了戏剧化但却真实存在的影响,怎样的解释才更具有说服力。

本文将围绕“意义”、“翻译”与“误读”(或者说“阅读”)三个核心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来对已有误读研究进行梳理,对翻译中的“误读”现象进行

① 威尔斯,《翻译学问题与方法》,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第19页。

② 许钧,《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7页。

多重标准的分类、多层原因的解析、讨论误读的意义以及研究误读的启示,期待能够深化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

本文试图放弃“意义的传递”或者“意义的再现”等说法,借鉴意义的不确定性理论、哲学解释学、读者反应文论与萨义德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还有译作“旅行的理论”)等与意义相关的理论,认为翻译过程就是解释、理解与传播、接受中意义的构建与后天生成过程,认为误读是翻译的常态,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误读产生的影响无论积极抑或消极,误读现象都无可回避,误读的作用都需要得到全面的评价。

意义既然是翻译的起点和终点,那么什么是意义?或者说“意义”的意义是怎么样的?意义的讨论没有定论。20 世纪的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哲学的这一转向带动了文学、翻译等学科对意义的重新关注。总的来说,人们对意义再度追问的一项成果便是认为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文本的意义不单单由文本自身决定,而是由读者在对语言符号的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即读者在意义的构成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学的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作者、文本和读者。综观 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范式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转折与变革,即经历了以作者创作为理解作品的根本依据的作者中心论范式时期,以文本自身